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1062000

1062000

周 恩 来

(日) 国木隆三

在江苏省北部的淮河和大运河间接的地方，有一座淮安城，她在淮河一带是中粮稻米的繁荣的古老的城市。

清朝末期光绪年间，淮安城中有一个姓周的家族，大家都知道这个家族中有两个人都是县长，周家的原籍是在以学者和产名酒而闻名的浙江省绍兴县，光绪24年(1899)周家生了个男孩，取名叫周恩来，是在绍兴生的也好，还是在淮安生的也好，总之，恩来懂事的时候是在淮安。

一提起江浙，江浙人(江苏省和浙江省的亲人)的名字，就立刻浮现在脑海里，两个省又是反抗元朝的文天祥、谋求复兴明朝的朱舜水等汉族人起来造反，反对不同民族元朝统治的根据地。

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周恩来，是由热心的伯母扶养下成长起来的，12岁的时候，伯父把他带到沈阳，进了沈阳师范第一小学，那时周恩来的脑袋后边垂吊着清朝统治的象征——长辫。在这一年前，毛泽东17岁，上了湖南县立高等小学。

周恩来在附小时，就受到了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康有为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上附小的第二年，发生了辛亥革命，周恩来在这一年剪去了长辫。1913年附小毕业后，进了天津的南开中学。毛泽东也在这一年进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不断用独创的理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毛泽东，同稳步地打下巩固基础的周恩来一起，偶然在同一年升学是很有趣的。

从信奉国家主义的小学到施行美国自由主义教育的中学，受到了强烈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影响的周恩来于1917年10月来到了日本。

日本留学生周恩来

这一年在日本的留学生约达44人，本来觉得能安排下中国的学生的日清馆已经挤得满满当当的了。那时在早稻田大学的大隈邸里有一个

叫长岛的妇女，她是大隈邸的管理员，是日下郎平的女儿，她细心地照顾着住在附近的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们洗衣服，以及作姻说恋爱问题的媒人。

大隈邸中还有一个人叫中西一树，是顾山满的堂弟，也是个不要命的鲁汉子，大隈邸里住着具有各种各样政治观点的人，要求日本政府对华21条以来，在很多警惕性更加革命的中国留学生人中，中西一树热情地支持孙文（孙中山），也是一个为了孙文可以献出自己一切的热情人，长岛受到中西一树的帮助找个住宿的委托，通过父亲日下郎平帮助，周恩来在京山欣街的山咀馆旧影院旁边一家京岛家具店的主人是个讲义气的地地道道的东京人，日清战争后，日本人骂中国人是“Channerm”，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老板娘们一看到中国留学生就暗暗地骂“Channerm还上大学”。京岛家具店的主人出于东京人的脾气，一听到这些话就非常生气的说：“什么‘Channerm’，你们这帮小子能上大学吗？”京岛家具店的主人已经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收留了一个姓陈的留学生，但是受到长岛的委托，再次答应收留了周恩来。

长岛的二儿子华雄（现在在东京地裁服务）12岁时看到了《朝日新闻》的广告介绍进了船会社，并到中国等地旅游，无形中更加爱中国了。

他航海回来后，受母亲的委托从家乡带来了送给周恩来的衬衣。长岛、华雄看来，觉得周恩来同其他中国留学生比较起来，除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是很一般的。尽管很年青，却很沉着、冷静，不轻易下结论，但这绝不能说是理应。

周恩来到日本后一度时间进了神田汪的高等预备学校，后上了法政大学。预备学校的确定的校名和上法政大学及学习时间记不清了（大概在2-7年以后）。上学时穿着深色带白斑的学生服，看来腰里还扎着一条布腰带。周恩来穿着日本式的服装，到现在的江戸川大乐堂前大街二号革命派机关报发行所去写传单，所以大学基本上没上。周恩来到日本后，很想吃有名的炸肉，但是又觉得太贵，只好买小的便宜的套煎蛋卷，连汤都不喝。有时也经常自己做豆付吃。

1918年5月6日，为了反对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分兵的要求，各省各校的中国留学生代表在神田会川小路的中国餐馆“维新馆”里，

召开了秘密会议，由于会议受到镇压，因而引起中国留学生集体归国的运动。那时周恩来是怎样活动的，是否集体参加了归国运动，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不大清楚，到去年才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参加了，并领导了这次运动。

在车中见到的中国留学生

中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以清山和夫的名义进行反战运动的黑善治听龔德伯、卫大楨二人說，周恩来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神乐坂警察局长在演說中肆意侮辱中国，对此中国留学生在神田的“中华青年会館”召开了抗议集会，集会的领导有东京大学的听讲生卫大楨（抗日战争后改名王大生）一高的学生龔德伯在会上作宣讀，碰巧神乐坂警察局长接到茶开为官内省的內命，他怕把事情弄大，就跑到中华青年館来哭丧着脸向三人道歉。

周恩来同中国的留学生们在中华青年館的地下室里，一面翻譯文件，一面悄悄地和大于荣取得联系援助大于荣出版资金等，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周恩来在这年春假回到了家乡。

那是1918年7月29日的事情，函館事业学校的汉族教員三木省吾在由东京到下关的特快列车上，碰巧和一个中国留学生坐在一起，但是他早就把这事忘記了。50年后的今天，1968年夏天，三木省吾翻閱北海道当时修路的日記时，〔发现北海道虽有一百年，但开道是在50年前（大約2—7）〕看到日記中有用布版刷写的周恩来的名字，虽然感到很吃惊，但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了。打开日記，7月29日的日記是这样写的：“我和坐在对面的那个留学生周恩来交談了日本文学和支那文学的情况，他是去年来日本留学的，日语讲得很好，也有不懂的地方，他問我能用英語說嗎？我想这也是可以看看自己的英語能讲到什么程度，这是好机会，就同意了。使我的是自己连一些日常用的一些字詞都忘記了，成了不合語法的英語。后来，我們在紙上用写汉字的方法进行交談，他很能讲，虽然是浙江省的人，但是我们交談的面很广，有几段是经过天津的事情，中国有名的作品，中国的字典以及中日友好等等。尤其是我夸贊了中国之后，他显得非常自豪，最后他給我留下了姓名，并希望給他写信。我也把自己的姓名留給了他。我在岗

山下车后改乘了字舒綫的火车”。用了一版印刷的已经发黄的卡片上写着周恩来，地址是铅笔写的“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周恩来已经回到他的家乡去了，和周恩来一起工作与抗议集会的代表 德伯要在这年底回国的。据岗崎茄平太說：周恩来回国前把亲密的同一年级的岗崎茄平太叫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說：“我想回中国去了，我想悄悄地走，因为咱们俩一直很好，所以和你說一下。”“別那么說，学习完了再回去……”，周恩来听他这么一說，脸上立刻露出悲憤的爱情說：“我不想在日本这个地方学习，日本混帳，我要有錢的话，才不到日本这鬼地方来呢！”1919年4月周恩来结束了一年来的留日生活回到中国。

毛、刘、周三人的道路

周恩来回国不是上了南开中学，上的是南开大学，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整个社会都在动荡。

“五四”运动是学生、商人、工人起来，最后发起以上海工人为主的大罢工，迫使军阀政府不得不拒絕在侮辱中国的巴黎和平条約上签字，这次运动也被称为市民外交的胜利，在北京的学生被大量检举，（大三）国府被封锁的时候，运动处于危机状态，得知这个消息的天津学生联合会馬上給上海学生联合会发了一封向全国呼吁的求援急电，为了转变这种局面，工人阶级于6月4日举行了总罢工。

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一个成员，是地下工作的领导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转折的关头，他担任了会报編輯长这个重要的职务。

“五四”运动的后期，杨以德在天津担任警察局长后，市民的各界联合会中都出现了被逮捕的人，学生联合会也遭了解散和封锁。十月底，学生们要求解除封锁和釋放被捕的人，包围了河北省政府，学生们选出周恩来和女子师范大学的女学生中担任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长的邓颖超两人作为代表，要求省长曹錕，曹錕却躲起来不见，而且还命令把門关起来，誰要进来就立刻逮捕。

警察把門关起来，在門内等候着，大門上只留下能钻进一个人的縫儿，四个代表好容易才从縫中挤进来，可是剛过来就被埋伏在兩旁的警察逮捕了，周恩来等四人就这样被天津的警察拘留了起来。被拘留期间，周恩来感到自己和邓颖超比邻而居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爱上了邓颖超。

在天津的監獄中，他教給大家挖地道的方法，但這種危險性他自己也是很清楚的。第二年，1920年4月，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出了獄。

前年的九月，周恩來自己做為發起人，親自組織了一個思想團體“覺悟社”，出獄的那年，出了雜誌《覺悟》。參加這個組織的人是有條件限制的：1.自己願意，2.能夠听取別人的批評。3.必須經過了各會員推選和全體委員同意。

“覺悟社”和毛澤東1918年在湖南組織的“新民學會”是一樣的組織，在接收會員的時候，毛澤東也是號召吸收“不怕艱苦，勇於為祖國獻身”的志士。

周恩來和“覺悟社”的組織，以拯救國家的道路為中心，研究了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和社會主義。1919年整個社會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各種各樣新思潮的衝擊和動搖、動蕩時期。周恩來、毛澤東等人受到李大釗、陳獨秀介紹的馬克思、恩格斯主義的影響之後，終於奠定馬克思主義立場。於是，這些各地的小組紛紛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始有組織的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第三國際的代表勃低欽斯基參加了中國青年團組織後進行的。那個時候掀起了打破公私費留學的框框、以勤工儉學的新形式去留學的熱潮（勤工儉學——戰後學習法國，由於勞動力不足，一面勞動，一面學習的新歐式州制度和思想的勤工儉學的留學）。

周恩來從監獄出來以後，已被南開大學開除了，沒辦法，只得在軍閥統治的黑暗社會中拼命地尋出路，秋天儘管和鄧穎超已約好要結婚，最後還是決定到法國去。在這種新型的留學熱潮中，毛澤東的朋友蔡和森及其一家，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李維漢、43歲的徐特立、周恩來、李富春、李立三、陳毅、鄧小平、饒漱石、聶榮臻、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陳延年、陳喬年等很多青年人，買了法國船上“四等船艙”的船票，從上海出發開始了旅行，這些人後來都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

只有毛澤東一人留在中國，劉少奇雖設法去法國，但在那年和任弼時、肖勁光、羅亦農等人一起作為第一批赴蘇聯留學生到莫斯科去了。在尋求新的救國道路上，觀點是一致的，但是毛、劉、周三人選擇的道路卻不同，這是很有趣味的。

在BERLLRIN见到了朱德

据说周恩来到了法国后，住在貧民窟里的中国人街上，在巴黎大学的政治系听讲，而且还一面当矿工，一面去SERUROK大学听课。

那时候，领导人之一蔡和森已经学习了阶级斗争和工农专政的理论，他一面給在湖南的毛泽东写信，一面批判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周恩来他专心攻读馬克思主义著作，和蔡和森等一起讨论馬克思理论。他们经常一起談心，問周恩来：“你参加我们的组织吗？”蔡和森、王若飞等人主張团结留法学生研究社会主义，他们刚刚组织起“劳工互助社”，周恩来馬上就参加了。他们通过巴黎生活的现实情况，亲眼看到了在沈阳附小常看到的江浙革命团体机关报《苏极》上发发表自己见解的吴稚晖，墮落成为“无政府主义分子”。巴黎的中国大使和吴稚晖等人取得联系后，只把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有錢的学生收进RNION大学，却不让貧穷的革命的留学生上这个学校。随着法国恢复战后经济的时期，留学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第二年，1921年2月，中国留学生要求生活和求学的权利，召开了勤工儉学留学生代表会，到中国大使館前进行示威游行。那次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向警予等人都被孤了起来。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周恩来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和法国工人的交往，認識了几名法国共产党员，并学会了法语。周恩来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充滿了信心，和法国工人手握手高唱“法国国歌”（后为国际歌）。

勤工儉学的留学生中，有各种各样特长的人。陈毅虽然是在GURUBURU大学学习电工学，他也很喜欢讨论，早就有“当代的文天祥”之称。薛荣臻也是学工学的，后来成了发展原子彈的負責人。矮胖的邓小平，只要是賭博，什么都喜欢。一到法国来，馬上就学起台球来了。因为他是謄写版印刷的負責人，所以还有一个“謄写版博士”的大号。李立三在那时经常把自己的见解称为“李立三路綫”。

1921年冬天，为和国内的运动相呼应，周恩来等人组成了“SY”，并出了机关杂志，周恩来是宣传干事，担当了編輯工作。

秋天传来了一年前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周恩来等人集聚在茶館里，兴奋地议论着：“我们也组织起来了”，在座的都是发起

人，他们把“SY”改成了“中国共产党巴黎支部”，使欧洲整个组织得到巩固。周恩来等人积极地深入到中国人中去发展党的组织。但11月份，他们接到了法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联系后，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理由，下令驱逐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出境的通知，失去了得力的党员，巴黎支部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周恩来保护了遭到破坏的支部和王若飞、赵世炎等人。第三国际的领导人ETMITOROFU（德米特洛夫）说：“今后周恩来一定是一个比陈独秀得力的领导人。”

第二年春天，周恩来为了加强党组织，使其发展到整个欧洲，到伦敦去建立了伦敦支部，十月又到了BERURIN。

在BERURIN过夜的时候，周恩来遇见了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走遍全中国没有实现愿望，没办法只好到BERURIN来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朱德。这一夜，他详细地了解了朱德的情况。从那以后，周恩来和朱德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周恩来把在陈独秀小资产阶级看来是不同意的同伴接收到共产党的阵营里来了。

那时，国内形势发展越来越快，劳动工会、农民工会不断增加。从1921年1月到22年2月，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于22年2月发动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包括取得了胜利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和香港、上海大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但是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因军阀武装镇压而失败了。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参加孙中山的国民党统一战线。可是这次大会，意见分歧是很大的，毛泽东居间调停，使趋一致。陈独秀因罢工失败感到希望已破灭，且不满地说：“工人如果加入国民党，就会染上资产阶级思想。”国共对立，党内的左右倾向，这时正在萌芽，国内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促使周恩来早日归国，也可以说历史催促着解决这些萌芽现状的周恩来的登台。

23年底，周恩来结束了在法国为期三年的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活，经过莫斯科回到了广州。

周恩来的警告书

1924年5月，有一个震惊广东市民的船队，它是为了孙中山革

命政府在这年六月举办黄埔军校，载来苏联的武器。

蒋介石是校长，党代表是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凯，GARON(廖龙)将军作军政两方面指导，国民党顾问也到任了。

周回国后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职务，GARON将军听了DIMITORFU(李米特洛夫)介绍了周恩来的情况后，命令把他提名为代理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陈毅、蒋荣臻也当了政治部的秘书。周到广州后，暗中注视国民党左派的动向。孙中山北上时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着手进行选举广州市长的事件。孙中山在天津知道了这件事后，马上给廖仲凯打了电报，让他进行调查，防止胡汉民的投机行为。周恩来以自己的职责把这个证明国民党右派、中间派的反动性和动摇性的事件整理成两个论文“最近两个月的广州概况——10月30日广州通讯”，在蔡和森编辑的中共机关杂志《向导周报》上以“伍豪”的笔名发表了出来。

他在论文中向孙中山提出了警告说：“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党中间派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周围的人，基本上是不革命的机会主义者”，“现在简直可以说国民党内部的投机空气和‘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就消失’的民国三年是完全一样的。”“通过广东的政治状况，可以明确的说，国民党右派任何时候都是不革命的，是和军阀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革命的只是左派，只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如果国民党想完全施行这种宣传的话，中间分子就一定会打破那种妥协的心理，果断地脱离开右派，听从孙中山的指挥，和革命的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国民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整顿内部’”。

第二年8月，果然发生了周恩来警告过的事情。那天，天气非常晴朗，按照杨毅生的恐怖命令，企图赶走左派的凶手杀害了访问国民党军部的左派廖仲凯。尽管广东的形势这样不好，但对周恩来说，他是终身难忘的值得纪念的地方，1924年，他和邓颖超在这里结了婚，这时周27岁。孙文去世，“五卅”事件，广东省港大罢工，整个社会在激烈的动荡。25年夏天，周大概是接受了秘密任务，穿着中山服出现在上海法租界的永安公司中，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在日本照顾自己的长岛的二儿子蕃雄。俩人互相凝视地看了一会儿，便大声打着招呼抱在一起了。周知道蕃雄是来买东西，就替他付了买物品的全部货款，来报答过

去的恩义，于是就消失在上海杂乱的街道上了。

战领上海的成功

廖仲凯被暗杀的事件发生后不久，蒋介石马上让左派汪精卫立刻开始调查。当知道国民党右派元老胡汉民和广东军阀有关系时，蒋介石就把这两个人驱逐出了广东省，汪精卫巧妙地收集了群众的愿望，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主席。

1926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周的警告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蒋介石认为这个事件是共产党要杀他的阴谋，于是下令逮捕了周恩来，搞了个解除第一军内54名共产党员的改变。军官学校的学生们听到周被捕的消息，纷纷起来要救出周，蒋介石只好把周放了。由于第三国际代表的指令，加陈独秀的妥协和让步，将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撤销共产党部长的提案，从那以后，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大体上没有共产党员了。

周在被捕之前，一直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作复杂的统一战线的工作的。就是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如果第三国际代表对蒋介石不抱有幻想的话，周也还是有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信心，如果对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成为蒋部下最有才能的将军胡宗南做一点努力的话，是可以站到这方面的青年人。但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当时拒绝了毛泽东马上揭露蒋介石阴谋的主张，却说：“蒋介石是民主革命的柱石”。对这种护蒋反共政变的说法，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中山舰事件”之后，周开始在毛举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活动，他担任了讲授军事活动和农民运动的课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战争。各地工人支援北伐的罢工和起义浪潮越来越大，但是在上海，26年10月和27年2月两次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都在军阀镇压下失败了。每次起义时国民党的起义领导人钮永建那种奇怪的行动非常引人注目，后来才知道，他悄悄接受了蒋的命令，使起义最后陷于失败的。

周被派来作为第三起义的领导人，到上海之前，周不放心地看着邓颖超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邓颖超两眼含着泪水，但有力的说：“你放心吧，我没关系”。这时邓已怀孕了。

周一到上海，就和党中央的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区委员会的

赵世炎、王若飞、罗亦农、陈延年等人进行了研究。周虽然是初次进行这种工作，但他还是鼓励大家“我们要有铁的意志”。并且没有忘记告诉大家，自己亲身体会到对蒋介石的猜疑。

3月21日正午12点，80万工人参加了总罢工，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开始袭击兵营的警察，并夺取武器，第二天上午，战斗终于集中到最后一个地方——北停车场，周把纠察工人司令部××第五区警察局搬到了商务书馆的俱乐部，他那总是炯炯有神的眼睛，由于彻夜指挥，充满了血丝，记忆力极好的周一个不漏地把周围工人的名字只问了一遍就全部记下来了。每当问到这个地方起义军的人数，指挥员的名字，移动去向和千变万化的激烈的战斗情况时，他总是立刻迅速正确地作出回答，工人们都非常吃惊。22日下午六点，北停车场上终于挂起了红旗，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了，前一天晚上在上海龙华的北伐军——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第二军也到了，促进这支部队进城的人是总工会派遣的。

周集合了各方面的纠察队，为了避免和租界的外国兵士发生冲突，占领了北停车场就立刻命令纠察队自停车场后方转移。

第二天，第一师团好不容易到达军工路，也是在那个时候，但是，率领第一师团来的不是白崇禧，而是受到想去帮助工人的士兵的压力违反了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命令，急速赶来的第一师团师长薛岳。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到龙华去的工会使者，一回来就气愤地说：“蒋介石发出了让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要和山东的上海守各司令部谈判。他还说上海不要让工人占领，因为有国民党革命军的军长呢！他妄想进行不流血就占领上海的谈判。”

周早就料到这点了，但是，他觉得蒋介石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北伐战争中，蒋仅有三个师，这三个师是全军中最弱的师团。且和第一步兵师一样，北伐军的士兵们都愿意帮助工人，他认为如果在国民党的将领中，培养出革命领导人的话，是完全可以使蒋孤立起来的。

第一师团进入了北停车场，周就向工人发出了修复铁路的命令。

这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了。起义刚开始时候，工人们还是一帮仅有150桿毛瑟枪的“乌合之众”，但是只两天一夜，就占领了除共同租界之外的全上海市。正象“五四”运动一样，尽管前两次都失败了，但周一登台就演出了一出漂亮的反叛剧，在外国军舰和军队面前建立了

上海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是必须写进中国近代史的事件。同一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李立三一起接收了第一个外国租界——英租界。

令人奇怪的是三个人，好像是商量好了似的，都没有参加北伐军，毛泽东35岁，周恩来28岁，刘少奇28岁，但在那前一年，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以后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

家长式的陈独秀和势力增强的去年领导人之间的领导权将要分裂，党内由于活动场所和小组的不同，开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活动，对这些现象周感到不安，而且危机总是要首先演到周恩来身上的。

不巩固的革命政权

工人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全世界共产主义都非常高兴，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领导上海起义取得胜利的英雄领导人的照片，巴黎共产党召开了群众大会，并给“中国公社”发了贺电。但是，奇怪的是登在机关报上的照片并不是真正领导上海起义的周等领导人，而是担心同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不肯占领上海的蒋介石。贺电的收电人也不是周，而是蒋。上海到处都刷上了一色的标语“国民革命军万岁！”“欢迎蒋介石将军！”这时周也还是认为是可以孤立蒋的。

3月29日，召开了由共产党主持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市民政府委员会。这时，在周面前又一次出现了和往年一样的无政府主义之灵，吴稚晖提出了“市民政府和党组织不同”的声明，得到了议席的资产阶级代表控制了市民政府，革命政府将在空中，这样一来，就不明白为什么要举行起义了。

陈独秀越是要急于和资产阶级建立政府，越是相反，起义胜利的果实，却越是牢牢地落在蒋介石的手中。

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觉察到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在上海的第三国际代表MANDARUYAN（曼德鲁）把收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听到这个消息后，陈独秀、周恩来、彭述之、罗亦农等召开了会议，为了避免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上海工人把武器藏在了地下。

4月1日，汪精卫收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的召电，从法国回

来了，第二天就和国民党左派的吴稚晖、張靜江等人召开了中央临时委员会，发表了质问共产党书，第三天蔣会见了汪，汪同意了革掉BORD OLIN（保勒金）的职务和解散工人糾察队的武装。周知道会见的情况后非常吃惊，他亲自出来，首先见了陈独秀和苏联顧問，又拜訪了汪，周使陈、汪二人相见，让陈劝汪說：周在BIRURIN（法地名）就听朱德說过汪是个象旦角一样的人，汪被陈說服后，发表了主張国共合作的共同声明，后来就到武汉去了。

这样，周好不容易才拯救了国共分裂的危机，这也是周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了他的劝說和調解的外交手腕。

4月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实力差距并不是很悬殊的，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像薛岳率领的第一师团那样同情革命的军队，但是蔣介石一到上海，首先发出了把第一师撤出上海的命令。第一师团从北停車場沿着铁路綫撤走了，周悲痛地凝視着士兵们一边向工人揮手告別，一边远去的队伍。

惊人的反共恐怖政策

和第一师团調防被調来的是敌視工人的白崇禧、周凤岐的部队，这样就失去了控制蔣介石反共政变的唯一手段。骇人听闻的“4·12”反共政变开始了，血腥镇压开始了，“指名逮捕第一号”，周恩来被捕了，受到了处于死刑的宣判，这时周恩来确实已处在被杀害的命运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遇到救命之神，黄埔军校的学生、白崇禧的弟弟偷偷地轉过手来，把周恩来釋放了。从九死一生中逃出上海的周恩来，4月27日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人都很惊疑，这是魂灵吗？甚至还有人喃喃地說：“他是个铁人”。

这次大会陈独秀、彭述之小组和瞿秋白、毛泽东等青年人小组之间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发现了分歧，周恩来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名符其实地进入了领导机关，其实在一中全会时，已经是军事部长了。大会閉幕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周恩来所担心的事情：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倒向右派一边，他的第一个反共行动是5月21日在长沙的反共政变。

6月份汉口工人糾察队接到了交出武器的命令，这项命令是国民党提出来的，但是代替执行这项命令的是陈独秀和刘少奇。8月18日汪

警卫集团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国共分裂，周恩来和毛泽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在大搜查前好容易撤出武汉。

发生反共政变的时候，邓颖超正难产在广州的一家私立医院住院。共产党委员会想通知她马上离开广州，但是敌人戒备很严，于是就让大学生出身的妇女党员陈铁军去联系，妇产医院周围乱哄哄的，都是士兵，陈铁军想：“万一被发现了呢！”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穿了一身很阔气的衣服进了医院大门，向邓颖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邓颖超接到指示后，很快就离开了广州。

由于反革命政变，保全住性命的人还算不错。周恩来在上海组织武装起义时期工作的赵世炎、罗亦农、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等伙伴们基本上都牺牲了。交出武器而失败的共产党在根据地九江召开了第三国际代表参加的“八·七”会议（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的决议，准备一次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击，并在这一次会议前就已采取了行动。

7月中旬，军事部长周恩来为了再一次准备武装起义，急忙从湖北武汉到江西南昌去了。

1927年7月18日，周恩来开始活动在南昌附近的一个原来成为根据地的小村里，在村子里接到了召开秘密会议通知的很多党员和干部集聚在一起，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蒋介石指名逮捕的人，这些人除了从武汉逃出来的人外，还有北伐军中被称为“铁军”的第四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第四路军20军司令贺龙、第八军叶挺和陈毅、江西农工领导人方志敏、从四川军阀杨森部下脱出来的刘伯承，还有把南昌的警军官学校置于自己指挥下的公安局长朱德。秘密会议决定了三个方针：1.发动南昌武装起义；2.在江西、湖北、湖南一带利用秋收季节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负责）；3.发动以武汉为中心的工人起义（苏兆征负责）。会议选出了南昌起义前总委员会，除了毛泽东和苏兆征以外，其余都在内，刘伯承是主席，周恩来是付主席。

由于差错 起义失败

南昌市中心中山路有一个“江西大旅馆”，这个旅馆是五层楼，有96个房间，是市内最大的建筑物，从正门进去，有一个很大的厅，大厅的各个角里，设有鸦片吸烟室。前总委员会为了保守秘密，事先租下

了这大厅，一层右边房间为军事参谋办公室，左边住着31岁年轻军官政治委员，他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学生，现任警卫连连长林彪。朱德是秘密党员，所以大家不知道他已入党。

在南昌市内外的军队中，国民党苏元军和第五路军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会议结果采用了周恩来的“麻将战”。起义的那天晚上，由朱德在公安局召集，这个军的全部将官开宴会，用打麻将的办法拖拉他们。可是这天晚上出了差错，在九江的张国焘跑来了，传达第三国际Romiaie（海东内译）的指示，说到要“没有成功的希望就不准起义”；其实，Romiaie接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说“起义如果没有成功的希望的话，即便放弃了也没关系”。可是张国焘在途中任意改了“不准”，妄图破坏起义。周恩来竭力解释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起义不能停止。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张国焘，但是因起义已到了8月1日凌晨，周恩来还是有一点不放心，这就是贺龙还没有入党，因此征求了贺龙对改日举行的意见，贺龙说：“行啊，我按共产党说的干，只要下声命令，干什么都行。”

这时出了一个問題，贺龙部下的一个付大队长听到上级说要起义就动摇了，结果麻将战没有按计划进行，周恩来接到朱德打来的紧急电话，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

起义初步取得成功，但仅有5天就结束了起义，队伍退到了南方汕头时起义军处于毁灭状态了。周恩来不习惯南方生活、地理和气候患了痢疾，高烧到40度，脸色铁青，这样起义军除了解散，别无出路，解散仪式结束后，是早上两点左右，为了脱掉敌人的追捕，部队仍在急行军，翻山的时候，郭沫若和伙伴们失散了。

周恩来等人到一个小渔村，乘上一艘小船到香港去了，贺龙、刘伯承到上海去了，叶挺和叶剑英看护周恩来，等他病好后，乘到上海的船到广东。

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的部队到毛泽东所在的井冈山根据地去了，一切都和北伐以前一个样子。

广东公社

城市工作是长期斗争的需要，周恩来拖着消瘦的身体在上海潜伏了下来，紧接着马上举行上海暴动。11月8日，政治局召开了临时扩大

会议，决定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并根据第三国际Noioman（诺依曼）的指示讨论了准备建立广东公社的计划。

18日，党中央命令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举行了广东起义，张太雷接到命令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刚出生的孩子和产后的妻子到广州去了。

在这之前，召开了“八·七”会议的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五人组成。“八·七”会议决定党中央成员有总书记瞿秋白，以下是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李维汉、刘少奇、张太雷。张太雷和周恩来是同乡，学生时代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这次广州起义两个人又在一起，周恩来担任军事部长职务。起义是12月10日半夜举行的，11日早上成立广东公社（广东苏维埃政府），在上海指挥起义的周恩来担任外交委员，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做外交委员的工作。广东公社起义的第一天下午就受到了敌人的反攻，敌我兵力相差7倍之多。12日天下着小雨，出席庆祝“广东公社”成立大会的张太雷（政府委员会主席）在会议开完后，乘车向革命政府办事处驶去，在惠爱路北大街上四名赤卫队员正在追击国民党便衣队，便衣队躲在商店入口处，用毛瑟枪向正在追捕他们的赤卫队员们射击，一个队员倒下去。这时张太雷的车子开了过来，张太雷已三天三夜没睡觉了，似睡非睡地倒在车上，听到枪声，他立即睁开眼睛，看到一名赤卫队员倒在血泊里，他拔出手枪大声喊“停车”！在他附近发现了一名便衣队员，张太雷的枪声响了，那个便衣队员应声倒了下去。又一枪，打倒了第二个。正当他瞄准第三个时，毛瑟枪响了，张太雷仰面倒下去了，只一枪就牺牲了。司机陈触抄起手枪，但便衣队提前开了枪，他也英勇牺牲了。这天下午，起义军总司令叶挺到司令部，电话已不通了，他走到窗边向叶剑英说：“现在是下午四点了，战斗已经不行了，预备队也用光了”。下午五点，战斗结束，大街上躺着2700具尸体，赤卫队员周文雍冒着小雨走在泥雨里……。

广东公社留下了悲伤的故事

公社失败的第二年11月，陈铁军由香港回到了广东，和周文雍一起在隐蔽的地方坚持地下工作。一天突然接到了出了叛徒的通知，陈铁军为没有回来的周文雍担心，一直在等他。但是，周文雍还没有回来之

前，隐蔽处已遭到袭击，两个人都被捕了。3月，两个人同时被判了刑，被人力车拉着向红花岗驶去，一路上他俩不断高呼口号。一到刑场，陈铁军一面向将要和自己一起献身的周文雍投去充满爱情的目光，一面向集聚在周围的人们大声说：“同志们，我和周文雍同志就要在这里牺牲了，我们出于工作的需要住在一起，互相帮助，感情上也互相接起来了，但是，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革命，还没有谈到爱情方面的事情，还没有结婚，现在，在我们将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的事业的时候，来举行婚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婚礼的礼炮吧。同志们，未来是我们的……。”陈铁军同志高呼口号以后，轻轻地走到周文雍跟前，亲热地吻了他一下，周文雍紧紧地抱住陈铁军，接受她的亲吻。礼炮的枪声响了……”。

就这样，公社以留下5700具中国人的尸体和起义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悲伤故事宣告失败了。

“不倒翁”的外号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新政治局由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组成。以工人为主体的书记局内的向忠发、李立三、顾顺章都是在上海武装起义被称为“上海四大健将”有名望的工人领导。李立三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中央书记兼军事部长，刘少奇当上了劳动部长，毛泽东也当上了委员。

周恩来事实上起着帮助掌握党内主要领导权的李立三的作用。一回到上海，就准备重建党组织，但是，由于政变而失败的工人们一点精神也没有，周恩来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向党组织提出了警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把刘少奇调到华北重建党组织；另一方面象毛泽东等人急速发展起来的红军组织那样，努力扩大红军组织。

当时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情况了解得很不清楚，在莫斯科登载了长篇关于毛泽东逝世的纪事，文章说毛泽东已重病，致使斯大林以为毛泽东已去世了。

1930年6月以来，由于攻打长沙失败，李立三退出了政治局。跟随第三国际一起回国的莫斯科留学生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沈泽民、杨尚昆等青年小组，对党中央领导表示不满，